

侨易学视角下的近代在华传教士^[1]

陈 涛

今天，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时代大背景，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已成为各国相互往来的重要内容之一；输出本国文化、吸纳他国文化，既是加深彼此了解、促进友好往来的重要渠道，也是一国软实力的重要展现。而在这一交流过程中，如何更有效地进行文化的传播与交融，则是各国都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中国融入世界整体的进程始于近代，因此，对于中国而言，文化的全球化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如果我们能回到这一东西文化交流的最初、也是最困难的阶段，对其进行考察，了解到当时的人们是如何跨越文化的鸿沟，最终达成彼此的理解、交流甚至相互学习，这对于当前世界的文化交流必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而当我们仔细考察近代东西文化的交流时，我们不难发现，这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群体就是来华传教士。不管是出于主观愿望还是客观效果，传教士群体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近代东西文化交流的桥梁角色，在他们身上我们既能看到文化交流的成果，同时也能突显出文化交流的障碍和问题。因此，如果能从文化交流的角度对近代来华传教士群体进行剖析，则无论是对于文化交流及其研究，还是对于近代历史研究，都能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传教士来华作为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现象，一直是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在我们过去的研究当中，一般的传统看法是：尽管传教士在其传教过程中，为中国带来了一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但从其本质来说，他们是服务于西方列强的对外扩张活动的，是帝国主义的侵略爪牙，具有很强的欺骗性，是要从思想上麻痹中

[1] 本文获“外交学院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ZY2011QC01。

国人民。

近些年，对传教士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学者们开始认识到，虽然在近代中国屈辱命运的形成过程中，部分传教士的确在不同程度上扮演了不太光彩的角色。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近现代又是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阶段，西方文明大量传入中国，中国人开始了解西方、学习西方；而西方人也在通过自己的眼睛去感受和了解这个在他们看来古老而神秘的东方民族。在这样一种东西文明相互了解、相互交流的过程中，作为到达东方的先行者，传教士这一群体在很多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文化交流学的角度来分析传教士问题，开始成为当下一一种新的研究趋势。

近代开始的東西文化交流，从相互不理解到冲突碰撞，再到相互了解甚至是模仿学习，并在这种向对方学习的过程中又加深对自身的认知。这是一个极其复杂而微妙的过程。在用文化交流学视角进行研究时，有时候我们会感到，仅用交流这个词，很难具体地描述出当时东西文化的这种相互关系，似乎还需要一种更具有创造性的提炼。而叶隽先生近几年提出的侨易学，就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深入的视角。

一、文化交流中的侨易学

所谓侨易学，“虽然也兼顾变易、简易的研究，但其核心部分则主要放在‘交易’层面。也就是说，研究对象（侨易过程之主体）是如何通过‘相交’，尤其是物质位移导致的‘异质相交’过程，发生精神层面的质性变异过程”。^[1]从具体的研究领域来说，“侨易学的核心内容乃在于探讨异文化间相互关系以及人类文明结构形成的总体规律”。其基本原则在于：“二元三维，大道侨易”、“观侨取象、察变寻异”以及“物质位移导致精神质变”。^[2]

当我们以侨易学的观念来分析东西文化交流时，就会在原有的文化交流学基础上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从文化交流学的角度来说，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与陌生人的关系。陌生人是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所提出的概念，他认为，文化交流中的陌生人是存在于某一群体之中，却与该群体联系松散的个体成员，群体内的其他成员并不完全接受他，他在某些重要方面也与其他成员存在差异，如文化、认知等。^[3]由于陌生人不为整个群体所熟悉和了解，他们的行为相对来说就带有很强

[1] 叶隽：《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页。

[2] 同[1]，第20页。

[3] 陈雪飞：《跨文化交流论》，北京：时事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的不确定性，难以预期，所以人们常常警惕地看待陌生人，极端的情况还会出现陌生人恐惧症（xenophobia），继而引发仇视，甚至导致非理性排外。^[1]

陌生人一方面会引发各种文化冲突和问题，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常常是承担着跨文化交流任务的人群。因此，陌生人如何化解自己所面对的困境，其交流能力如何，就成为跨文化交流成功与否的关键。有学者将人们跨文化交流的能力归纳为7个要素，即：向对方表示尊敬和对其持积极态度；采取描述性、非评价性和判断性的态度；最大限度了解对方的个性；移情的能力；应付不同情景的灵活机动性；轮流交谈的相互交往能力；能容忍新的和含糊不清的情景，并能从容不迫地对其做出反应。也有学者将之进一步概括为动机、知识、态度和行为四个方面。^[2]

作为跨文化交流的核心，“陌生人”恰好体现了一个侨易的过程。首先，他们通常是身处一种异质文化之中，而要出现这一情况，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一定经历了物质位移。其次，他们所引发的“陌生人恐惧症”以及他们化解自身困境、最终形成较为顺畅的文化交流的过程，就是两种文化互动博弈最后导致新思想出现的过程，也正是精神质变的发生。

二、作为陌生人的近代在华传教士

当我们以跨文化交流的视角来看待近代中国时，我们会发现这种陌生人的现象十分突出。不论是来华的西方人，还是早期出洋的中国人，在他们身上都充分体现了文化陌生人的特点。在这里我们将重点分析来华传教士群体当中所体现出来的情况。

1. 传教士的陌生人身份

最早来到中国并有意识进行文化传播的应该是以传教士为主的宗教群体，来自西方的基督教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因此，传教士们想要说服中国人入教，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实际上，清朝初年，康熙就曾于1721年宣布禁教，这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罗马教皇于1704年和1715年两次为中国教徒制定“禁约”并派使节到北京，要求康熙皇帝执行。而“禁约”的主要内容是要求中国的基督教徒不得祭祖、祭孔，这两条内容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完全相悖，同时也是在挑战中国皇帝统治国家的根本原则，因此，康熙才决定禁止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这或许

[1] 陈雪飞：《跨文化交流论》，北京：时事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2] 同[1]，第286-287页。

是西方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儒家文化的第一次大规模正面交锋，其结果显然并不乐观。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国被迫签订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传教不再被中国官方禁止，变成合法行为。然而，传教士们在传教的过程中所遇到的来自中国社会的问题却要更加困难和复杂得多。这里的一个主要原因固然是由于西方列强当时在中国的侵略者身份使得这种文化交流很难在平和、正常的环境下进行，但同时，从文化交流学的角度来说，在华传教士的陌生人身份也是引发交流障碍的一个重要原因。

2. 传教士引发的陌生人恐惧症

由于本身就处于东西文化交流的初始阶段，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自然会格外突出。再加上近代来华传教士从一开始就是与西方殖民主义者捆绑在一起的，这就使得中国人很难对他们有好感。随着西方人在中国不断获得特权，中国老百姓对传教士的反感和厌恶也就越来越突出；而那些信教的中国人，也因此会被看作是趋炎附势的小人之流。而实际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的确如此，“事实上，许多人就是怀着其他目的加入教会的。他们想通过教会来支持自己的法律行动”。^[1]一些老百姓加入教会确实是为了一己私利，为了依附于西洋人，从而为自己谋取利益。

除了政治方面的侵略者身份所带来的困境之外，传教士们在中国所需要面对的是一种已经流传了一千多年且高度成熟的文化传统。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体系，同时也已经深入到中国人的骨髓之中，能解决人们生活中的几乎全部问题。对于中国人来说，一种新的思想体系是没有多少存在必要的。因此，要想说服中国人抛弃被整个民族长期奉为圭臬的传统思想，转而相信一种完全陌生的思想观念，其中的困难也是可想而知的。传教士们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很自然地在中国各个社会阶层当中引发了陌生人恐惧症。

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士大夫们看来，基督教中的一些思想观念与儒家传统相抵触，如基督教反对祖先崇拜、认为父母兄弟皆为平等教徒，这在中国传统的家族观念中，就是数典忘宗、犯上作乱、贻害国家的罪行。“今天主教曰人死无知，不必立主，祖宗不必祭祀，灭子孙爱敬之心，败国家孝治之化，此其灭绝祖宗，不如豺獭。”^[2]因此当时的士绅们常常利用自己在当地的影响力，发布檄文揭帖，对基督教教义进行批判，禁止百姓信教。晚清时期，在许多地方流传有全面批判基督教的《辟邪纪实》一书，

[1] [德] 卫理贤：《中国心灵》，王宇洁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20页。

[2] 王炳燮：《上协揆倭良峰中堂书》，《毋自欺室文集》卷六，转引自吕实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反基督教问题论文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8页。

便是其中典型。

与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批判相比，普通老百姓对于基督教的警惕甚至恐惧仇视情绪要更加简单，但同时也更加强烈。普通老百姓并不关心西方人是否侵犯了中国主权，也不关心上帝的教义究竟在哪些方面与孔子的教导产生矛盾，对于他们来说，更重要的事情是，西方人到来之后，自己的平静的生活开始被打破。在中国普通的老百姓看来，这些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长相怪异的人在城外高山上建起了怪模怪样的教堂，那高耸入云的尖顶一定触怒了天庭中的神仙，所以才导致今年大旱；他们还要修什么叫作铁路的东西，而且还为了修那东西把村外的小山头给挖开了，村子的好风水就这样被破坏掉了，这是要断子绝孙的！在中国的老百姓中间，一直流传着各种对于教堂教会的谣言。有谣言说，之所以会有中国人信教变成教徒，是因为传教士偷偷向这些人投毒，迷惑了他们的魂魄；甚至有谣言说，传教士挖人眼睛、残杀孕妇、吃婴儿等。^[1]这些谣言将教会、教堂描绘成恐怖的异端组织，将传教士们描绘成吃人的魔鬼。所有这些，正是陌生人恐惧症的一个较为极端的体现。

三、近代在华传教士的侨易过程

如前所述，物质位移对于传教士们是一个基本不存在疑问的情况，因此，当我们将之作为侨易学的一个个案来进行探讨时，我们所关心的便是其精神质变的过程，即传教士们是如何化解他们所引发的陌生人恐惧症，如何在这个化解的过程中实现异质文化之间的相互博弈。

可以看到，近代在华传教士们所面临的状况是十分棘手的，而其根源则主要都来自于东西文化的隔阂。在中国人中所引发的陌生人恐惧症使得传教士们想与中国老百姓进行基本的交流都困难重重，传教就更是无从谈起了。因此他们必须采取有针对性的文化行动，以化解自己所面临的困境。

1. 传教士的应对手段

从历史现实来看，一部分传教士在面对这一困境时，选择了利用当时西方列强在华特权，以强制甚至暴力手段来解决问题，由此酿成了晚清历史上的大量教案，并最终导致了义和团运动的爆发。从文化交流学的意义上来说，这一部分人显然是缺乏跨

[1] [美]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张汇文等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37、240页。

文化交流能力的，其交流也是失败的，在他们身上体现的是一种负面的侨易现象。

因此我们更重视另一部分传教士的行为，他们开始改变自身。从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四个方面即动机、知识、态度、行为来分析，这一部分人具有交流的动机，但可能缺少对自己和交流对象的知识，因此他们通过改变自己的态度，并付诸具体的行为。他们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了解中国人的生活模式与思维方式，从思维、文化、感情上亲近中国老百姓，减轻甚至解除自己的陌生人身份，从而为文化交流打开了大门。

首先，这部分传教士开始学习中文，学习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来生活。语言是交流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因此中文的学习成为大多数在华传教士首先需要做的一项工作。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传教士们往往是以中国私塾中的教学方式来学习中文的，“这种学习汉语的方法，靠的是对下意识的影响而不是智力，但中国人居然实践了几千年”。^[1]但也许正是由于他们采取了与中国人类似的语言学习方法，他们也就更容易理解中国人的一些思维习惯。

除语言之外，改变服饰甚至是饮食等生活习惯，也成为当时传教士中十分常见的现象。在近代传教士所遗留下的影像资料中，我们经常能看到他们头戴瓜皮帽、身穿长袍马褂的形象。“1866年，当第一批中国大陆布道团传教士从上海动身去内陆城市的时候，男人们穿上了长衫，剃掉了额发，梳起了大辫子，女人们则盘起了发髻，穿上了宽松的旗袍。”^[2]更有甚者，“南方浸礼教会的夏洛特·迪格斯·穆恩”，“她说她按照当地人的习惯吃饭、睡觉和穿衣，但她‘不喜欢中餐，也喝不惯茶叶，然而参与社交是赢得人心的一种方式’”。^[3]

其次，一些传教士开始学习儒家文化传统，并以儒家方式宣传基督教。儒家思想是一套完整的社会思想体系，它成为近代在华传教士需要攻克的一大难题。如果不了解儒家思想，不了解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他们与中国百姓的交流就永远只能停留在相互觉得好奇的最初级层面，无法深入，当然也就更无法说服中国人相信他们的上帝。因此，一些传教士开始让自己的精神也接近中国人。

在这一过程中，传教士的陌生人身份既是他们需要尽力改变的，但同时也为他们了解儒家文化提供了一些便利。从交流学的角度来看，陌生人除了会造成陌生人恐惧之外，也有自身的优势，就如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局外人（outsider）与局内人（insider）的区分一样。本地人对群体内的事物习以为常，一切都视为理所应当，从不

[1] [德] 卫理贤：《中国心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4页。

[2] [英] 罗伯茨：《东食西渐：西方人眼中的中国饮食文化》，杨东平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版，第54页。

[3] 同[2]，第55-56页。

思其为何如此。陌生人则不同，他们有自己独到的远距视角。^[1]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传教士们在深入了解儒家思想之后并未由此被同化，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批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汉学家，并利用自己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宣传基督教义。

众所周知，利用儒家思想宣传基督教义始于利玛窦时期，他在其《天学实义》一书中第一次利用儒家思想论证基督教教义，强调基督教与儒家思想并无矛盾，而是相通的。而与利玛窦同时期的罗明坚，在其著作《天主实录》的扉页写下“仁义礼智信”，以标榜自己对儒学的认同。稍晚一些的花之安，其著作《自西徂东》更是直接分成五个部分，即仁、义、礼、智、信五集，全书遍引《诗经》、《论语》、《周礼》等，按照儒家的体例来宣传基督教义。这种主动向中华文化示好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长期受儒家思想浸染的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敌视，也多少减轻了加入基督教的中国信徒们的社会和文化压力。

2. 传教士达到的精神质变

在侨易学的视野中，这里的“易”、即精神质变并不是简单的变化和改变。“它既有强调变化的一面，更有强调‘交易’，交互之间的关系与变化，以及‘不易’的一面，也就是‘恒常’的一面。”

在此视野下来分析前述传教士的行为，首先，他们达到了“交易”的目的，即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一部分中国人的思想传统。

从传教事业本身来看，已有大量研究证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教徒人数大量增加。教徒的增加带来传教士人数的增长。根据统计，19世纪最后40年，天主教传教组织迅速扩大。到1870年，大约有了250名欧洲神甫，15年后，又上升到488名(包括35名主教)，到1900年则达到了886名。新教传教士的发展同样引人注目。1864年，在中国有189名传教士，1874年，有436名新教传教士。到1889年达此数的3倍，到1905年则上升到3445名。^[2]

从更广泛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层面上来看，传教士这些行为的效果更为深远。他们培养出了大量西方文化的信奉者和传播者，他们的行为本身虽然是以宗教为出发点的，但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其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宗教的领域。传教士们出于传教需要所进行的这些活动，恰恰打开了西学东渐、东西文化交流的大门。

[1] 陈雪飞：《跨文化交流论》，北京：时事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2] [美]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上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38、539、540页。

其次，传教士们所进行的这种文化交流同样也保存了不易和恒常。从更长远的范围来看，尽管有大量的中国人开始信奉西方文化，但东方传统并没有因此消失。相反，在经历了与西方文化的交锋和互动之后，东方文化的自我意识更加突出，更加注重自身的完善。在传教士们的影响下，也有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能以一种平等的态度对待东方文化传统。

小结

尼采在《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中曾提出过著名的精神的三种变形：精神如何变成骆驼，骆驼如何变成狮子，最后狮子如何变成小孩。这恰恰与侨易学中的精神质变形成了一种相互呼应。具体到近代东西文化交流中来，传统的东方思想正是骆驼，当受到传教士们所带来的西方文化的冲击时，骆驼变成了狮子，最终，东方传统文化在经历了种种曲折起伏之后，得以变成小孩，重新获得新生。